

# 《诗经·国风》情绪词库的构建与分布规律研究

陈金美

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以《诗经·国风》160首为封闭语料，通过逐句精读与人工判读，系统构建了涵盖163条词条的情绪词库，确立了“情绪大类—情绪标签—语境实例”三级分类体系。统计发现，国风情绪词以“思”（33.1%）与“忧”（27.6%）为双核，两者合计占比超过六成（60.7%），消极情绪占比达60.1%，揭示了贯穿《诗经》的“感伤母题”。七大情绪大类分布呈现出以“思—忧”为主轴、以“喜—哀”为对称、以“惧—怒—恶”为补充的有序情感系统，折射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宗法制度下个体情感空间的结构约束。本研究为上古汉语情绪词汇研究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框架与可复制的数据基础，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提供了量化支撑。

**【关键词】**：《诗经》；情绪词库；国风；分布规律；感伤母题

DOI:10.12417/2982-3803.26.02.045

## 1 引言

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诗经》作为华夏文明的元典与最早的诗歌总集，不仅是中国抒情文学的活水源头，更是承载上古情感表达、塑造汉语词汇文化特质的重要范本（向熹，1993）。正是基于这一无可替代的文化地位与语言价值，《诗经》词汇研究历经两千余年积累，形成了深厚的学术传统。

早期研究以经典阐释为主，清代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融训诂与文学性于一体（于春莉，2018），戴震以考据精神著称（徐玲英，2015），标志着传统经学向实证研究的早期转型。进入现代学术期，向熹先后发表《〈诗经〉与汉语词汇》及续篇，将《诗经》词汇置于汉语词汇发展史的宏观框架中加以审视。此后，学者们在疑问词（柴秀敏，2007）、颜色词（李顺琴等，2011）、复音词（刘馨阳，2018）、建筑类词汇（于为，2018）、服饰类词汇（陈练军，2023）等维度展开了专题化研究，从语法功能、语义系统、历时演变、认知机制等维度共同构建了《诗经》词汇研究的立体图景。

然而，《诗经》中的情绪词——这一承载先民丰富情绪情感体验的核心词汇类别——尚未获得系统性聚焦与专深探讨。王珏（2016）曾以情绪类“心”部字为切入点进行特征分析，但该研究囿于注疏传统，未能将情绪词作为独立词类加以系统考察，也无法面向诗歌文本建立可操作的分类框架。与此同时，以概念行为模型（CAM）为代表的“心理建构观”明确指出，情绪词不是已有情绪的标签，而是情绪产生和感知的本体（陈新葵、张积家，2017），这一理论转向从根本上重新定位了情绪词的研究价值。

基于此，本研究以《诗经·国风》160首为封闭语料库，构建系统的情绪词库并探索其分类体系与分布规律，重点回应三个核心问题：如何构建贴合文本特质且具备现代分析效度的分类体系？国风情绪词汇的分布规律与主导类型是什么？七大情绪大类的分布特征折射出怎样的文化与社会心理？

## 2 研究设计

### 2.1 语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诗经·国风》160首为封闭语料库。因为国风源自十五国民间歌谣，情感表达直白鲜活，贴近先民日常情感体验，为情绪词的提取提供了最具代表性的样本。研究采用文本细读与结构化标注相结合的方法：（1）逐句精读国风160首原文，识别并提取直接表达情绪的词语；（2）结合上下文语境判定每个情绪词的具体语义与情感色彩；（3）参照《诗经词典》（向熹，2014）等工具书核验词义；（4）将全部数据录入Excel数据库，形成结构化词库。

### 2.2 情绪词的界定与识别标准

本研究将情绪词操作化界定为：《诗经》国风文本中，能够直接表达、描述特定情绪感受、体验、情绪状态的词。具体识别标准包括三项：1.语义标准——该词的常用义或语境义指向某种情绪感受或状态；2.语境标准——该词在具体诗篇语境中确实承担了表达或触发情绪的功能；3.排除标准——若该词在语境中并非表达当下真实情绪感受（如“适彼乐土”之“乐”），则不纳入词库。

### 2.3 情绪词的分类依据与三级体系构建

本研究采用“扎根于文本”的归纳式路径，通过对高频词的聚类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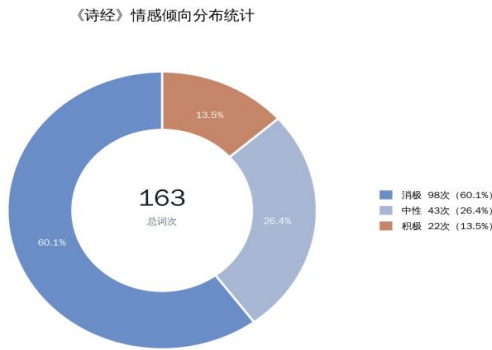


图3 《诗经·国风》情绪词倾向分布

### 3.2 七大情绪大类的分布特征

对163条情绪词进行情绪大类统计，发现七类分布呈现显著差异（见表2）。

表2 《诗经·国风》七大类情绪词统计

序号	大类	数量	占比	主要词汇（出现次数）	情感倾向
1	思	54	33.1%	思(31)、怀(13)、念(7)等6词	中性40次、消极10次、积极4次
2	忧	45	27.6%	忧(23)、劳(3)、忧心钦钦(3)等19词	消极45次
3	喜	21	12.9%	乐(12)、夷(2)、喜(2)等8词	积极18次、消极3次
4	哀	20	12.3%	伤悲(3)、悔(3)、悼(3)等10词	消极17次、中性3次
5	惧	13	8.0%	畏(9)、惴惴(3)、恐(1)	消极13次
6	怒	7	4.3%	怒(3)、愠(1)、忮(1)等4词	消极7次
7	恶	3	1.8%	恶(1)、醜(1)、憎(1)	消极3次

“思”类以54次（33.1%）位居首位，“忧”类以45次（27.6%）紧随其后，两者合计占比超过六成（60.7%）。这一格局与《国风》中大量婚恋诗、征役诗、怀人诗所表达的怀远之思及由离别、困厄所引发的忧愁情绪，形成了高度契合，与曹艳红（2014）关于《诗经》“屡屡抒发羁旅途次的忧愁痛苦”

### 参考文献：

[1]向熹.《诗经》与汉语词汇[C]//河北师范大学.1993 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中文系,1993:412-427.  
 [2]向熹.《诗经》与汉语词汇(续)[J].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01):68-73.

的文学批评判断相互印证，也与王珏（2018）从训诂统计层面得出的“忧”字训释居首的结论形成跨层次互证。

“喜”与“哀”数量接近（21 VS 20），但情感倾向截然不同。“哀”类全部为消极（85%）或中性（15%），在七个情绪大类中，仅“喜”类以积极情感倾向为主（18条，85.71%），其余六类均以消极或中性为主导。这一分布格局揭示了国风情感基调的一个重要面向：其抒情重心在于表达对缺失对象的向往与对现实困厄的感慨，而非直陈欢愉——这恰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之现实主义精神的情感印证。值得注意的是，“喜”类情绪词的情感倾向也并非纯积极，其中3条为消极，3次被标记为消极，对应《隰有萋楚》中EQ144“乐子之无知”、EQ145“乐子之无家”等的反讽用法，在“人不如草木”的比较框架下，草木因“无”而得以摆脱人世牵绊，“乐”的积极义值被语境压制并反转为悲苦。这表明《诗经》的情绪词并非固定不变的情感标签，而是在认知框架转换中被动态建构的产物。

“惧”“怒”“恶”三类合计仅占14.1%，说明《诗经》的情绪表达以思虑忧愁为主，激烈情绪相对内敛。其中“畏”字高度集中于宗法性恐惧（如EQ078“畏我父母”、EQ084“畏人之多言”），从情绪建构论视角审视，已成为宗法礼教将社会规范建构成个体情感体验的语言标记，即个体对礼教秩序的顺从，并非源于外力的强制，而是经由“畏”这一情绪概念被内化为一种身体化、情感化的自我规训。

### 4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以《诗经·国风》160首为封闭语料，构建了涵盖163条词条的情绪词库，确立了三级分类体系，得出三项核心发现：第一，国风情绪词以“思”（33.1%）与“忧”（27.6%）为双核，两者合计占比超过六成，消极情绪占比达60.1%，揭示了贯穿《诗经》的感伤传统。第二，七大情绪大类形成有序情感系统，折射出宗法制度下个体情感空间的结构约束。第三，“喜”类中“乐”字反讽用法初步印证了情绪建构论的核心命题：情绪词的情感极性并非词汇层面预设，而是经由具体语境与认知框架动态建构的产物。

展望未来，可将词库扩展至《雅》《颂》以完成《诗经》全本情绪词汇图谱，并引入评分者间信度检验推动词库标准化，探索其在情绪素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中的应用价值。